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13位ISBN编号：9787806595626

10位ISBN编号：7806595627

出版时间：2004-5

出版时间：巴蜀书社

作者：葛维汉 (David Crockett Graham) ,李绍明, 周蜀蓉 选编

页数：413

字数：3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内容概要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是美国学者David Crockett Graham（汉译名葛维汉）关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论著的选集。这些论著都是他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旧作，代表着那时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水平，而这些论著的范围则主要在四川地区。

为了充分继承和汲取前辈学者的科研成果，早在1973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即组织有关学人将葛维汉在四川考古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进行了翻译并内部印行。此后不久，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又组织有关学人翻译和内部印行了葛维汉有关四川的民族学方面的一些代表著作。

为了让更多的学者了解葛维汉的著作，今择其这两方面的代表作，加以整理正式出版。书后还附有（美）苏珊·R·布朗所撰葛维汉传记一份和四川大学博物馆周蜀蓉译编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一份，以供读者参阅之用。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作者简介

李绍明，男，土家族，1933年12月出生于四川，195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曾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顾问。

已出版《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民族学》、《彝族古代史》、《李绍明民族学文选》、《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等多篇专著。

所撰写的《四川省志·民族志·藏族志》待出版。

先后9次获四川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奖。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书籍目录

序 羌族的习俗与宗教 前言 简介 1. 邦域 2. 历史 3. 语言 4. 居民 经济生活 1. 交通和通讯 2. 货币、市场、易货贸易及借贷 3. 民居、碉楼和村寨 4. 职业 5. 农具、工具和家具 6. 食物和农产品 7. 衣饰 民间故事和山歌 1. 民间故事 2. 山歌 社会习俗 1. 社会生活 2. 订婚 3. 婚姻 4. 生育 5. 疾病 6. 死亡与丧葬 宗教 1. 灵魂及来世 2. 世界观 3. 神灵 4. 巫师制度 5. 神圣的法器 6. 法事 7. 神林 8. “圣经” 9. 咒文与驱魔避邪 10. 希伯来人起源的传统 结论 参考书目 附录：地名英汉对照四川苗族的宗教与习俗 四川苗族的故事与歌谣 四川古代的白（焚）人墓葬 川南的白（焚）人墓葬 有关白（焚）人的历史文献—留存于四川的最后一批傣族 汉州（焚）发掘简报 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石器 四川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 中国石器琐记 附录一：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 附录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英文篇目索引中文篇目笔画索引分类索引作者索引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章节摘录

书摘 13. 婚姻 几乎每个村寨和家族的婚俗都不同。

婚礼择吉日举行。

通常同姓不通婚。

有时候男女在很小的时候——不足10多岁就结婚了。

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常常采取招赘的形式，让男子入赘女方家，并从女方姓。

当然他们的孩子属女方家，随母姓。

笔者曾听说一个家中三代都如此。

如果长兄去世，留下寡嫂，则兄弟可以娶嫂，他们的孩子则属于去世的长兄。

但在一些村寨，长兄不能娶兄弟的遗孀。

如果没有兄弟，则嫂子可以嫁给丈夫的堂兄弟，出生的孩子也属于她第一个丈夫。

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在中国政府中做了高官的羌族男子不会娶地位低下的羌族女子，而常常娶其他民族的与他有同等地位的女子。

九子屯的头人在1933年娶了一位嘉绒女子，1942年布瓦寨，一位官员娶了一位汉族女子，而她不会羌语，更不懂羌族的习俗。

在大和平寨，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每次他和她都只喝一半，然后把酒杯交给对方喝完。

1933年，笔者得知，在和平寨和龙溪寨一带，新娘要坐“花轿”到新郎家。

到达后，有两个人扶着新娘进屋，新郎和新娘要对家神、双亲、新郎的祖辈及其他亲朋好友叩拜。

1941年，笔者在和平寨看见，新娘被一种普通的轿子抬到新郎的家中，护送她的不是叔伯，而是她的兄弟姐妹；同时新郎家中也派了10多岁的两个小伙子和两个姑娘来接亲。

他们到达新郎家中，新郎新娘双双敬拜家神，并向新郎的父母、祖辈和舅舅鞠躬，然后是亲朋好友和来宾。

当然，举办婚宴时要收礼和置办至少一次酒席。

在羌族地区几乎没有人离婚。

少见的案例是一个人和他的妻子不和谐，他把妻子卖给了另一个人为妻。

印有丈夫手印的合约上写着：他保证不给前妻和新丈夫找麻烦，并在今后不向新丈夫索要更多金钱。

有时，作为婚礼的一部分，要邀请巫师做宗教法事。

他点燃香柏枝和香，口里念念有词，在房顶神龛敬神，告之神灵婚事，并为这对新人祝福。

下述有关反映羌族婚姻的真实情况来自于前所提及的资料：当年轻人成人以后，男方家通常在农历的六月和七月要送给女方家酒礼，并通知他们是准备结婚的时候了。

从这时起，两个年轻人就不能说话，即便见面也如此，婚礼通常在农历的腊月或冬天举行。

在婚礼的前一天，男方父母要派4至6人去接回新娘。

他们带上聘礼，诸如1.8米长的红布、3.3米长的带子、1把梳子、1捆爆竹、1对红蜡烛、2坛酒、衣服和礼金。

所有这些都放在一个大的木盘上，由迎亲队伍送到女方。

当他们一到新娘家，就要点起爆竹，新娘和她的亲友听到响声，都会流下依依不舍的眼泪。

迎亲队伍进入家门，新娘的亲戚会鸣枪以示欢迎，迎亲队伍要对女方的父母表示祝贺。

新娘的家点着蜡，焚着香，他们把暖酒倒进碗或杯子，先敬诸神。

迎亲队伍和新娘的亲朋好友共进晚餐，饭后主人和宾客、亲友聚在一起喝酒。

饭后亲友和宾客从长者开始，按年龄尽兴饮酒。

在一些地父母人们还唱歌跳舞。

在这种场合有一种歌很典型，它歌颂了(母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现在她离家出嫁，希望她在夫家能够得到尊重，能和丈夫家的兄弟姐妹和睦相处，好好生活，而不使娘家蒙羞。

在唱的时候，亲朋好友都要流泪。

之后一些未出嫁的姑娘会送给新娘一些绣花鞋，她们也加入唱歌，这样，人们通宵达旦地唱歌跳舞。

在深夜，新娘的朋友和其他人要唱：姑娘长大了，她必须要出嫁，不必那样遗憾，如果新娘孝顺她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的公公婆婆，她和她的丈夫相爱很深，他们就会白头偕老，幸福地生活。新娘要回唱表示不愿离开她的亲朋好友，并说她禁不住痛哭，舍不得离开。

该书是笔者对羌族多年直接调查研究的结果，也参考了中国历史学家、中国和亚洲学者相关的学术成果。

在调查研究中力求准确地反映民族的生活和习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们天生的谨慎和意愿会提供一些虚构的、不正确的答案，他们相信这样会满足提问者的要求。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和习俗，这种多样性更增加了调查的难度。

当调查者蒙蔽的时候不可能总有收获，他需要非常仔细地、反复核实他所得到的信息。

羌族正在被汉族所融合。

有通过文化和商贸接触产生的接触，也有异族通婚。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羌族地区的村寨修建了一些汉式学校，这些学校传授的是汉语和汉族的文化。

在威州的一所正规学校，已得到了族和羌族学生的认可。

一些羌族的后裔也不再自称为羌族，有些当地的羌族说汉语，穿汉装，遵守汉俗。

布瓦寨的一位首领是羌族人，他娶了一位汉族妻子，此地在1942年只有2至3名最年长的人能说羌语了。

羌族人不是一神论者，但要崇拜众多的羌族神灵和汉族神灵。

除了巫师保护神、魔力至上的阿爸木纳，他的头有时被雕刻于巫师的神杖上以外，羌族的神灵没有具体的偶像。

羌族信奉五大神灵，其中，至高无上的神木巴瑟是天神，他非常近似于天或天堂。

联合羌人在公元前1121年推翻了商朝的周人的至高无上的神就是天神。

羌族还敬奉十二家神，许多地方的和特殊的神灵，连树、石都被当作神灵来祭拜。

汉族诸神无论有无偶像，羌族都认为它们是真神，要予以崇拜。

木巴瑟被很多人视为道教中的玉皇大帝。

近年来，人们把他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耶稣等同。

在还愿或履行诺言的时候，牺牲作为礼物供奉给神灵，以谢神灵的恩惠。

在春天，人们要举行许愿法事，向神灵祈求好的收成、风调雨顺和兴盛的一年，并许诺在入秋时以礼还愿。

这些供品被献于房顶上或神林中。

房顶上的祭拜是家庭的祭祀活动，只有神林中举行的仪式才由全村寨的各家各户派1至多名代表参加。

只有男子才有资格参加或目击房顶上或神林中的宗教仪式，女人被认为不洁或下贱，因而不能参与。

家中的祭祀活动可以由家中成员主持，但在重大场合必须请巫师来主持。

巫师进行法事时有普通人当助手(司仪)。

巫师有自己的法器、圣经和符咒，以及表演法事的各种方法。

在神林中最被人们所敬奉的树是一棵榕树，也有其他种类的树。

人们认为白石是很神圣的，是人们在它的旁边谄拜神灵，与神灵进行适当交流的物体或地方。

这些白石通常压在神林、羌族寺庙、家中房顶的神龛上，有时也被放在墓穴的顶端和房屋大门的墙上，作为镇邪之用。

过去，火葬是处理尸体的唯一方式。

现在已演变为对只有凶死、不正常死亡会变成厉鬼的人才保留用此法，而一般人去世采取土葬的方式。

羌族没有书面的文字。

《圣书》里只有用于占卜的图画，以及通过巫师世代口传心授凭记忆背诵的宗教念词。

巫师制度似乎正在渐渐地消失。

驱魔避邪的仪式有很多种，人们相信患病、死亡和其他的许多灾难是邪魔所致。

这些仪式包括清扫房屋、踩犁头、化水、封魔于罐埋在路下等等，这些法事都是由巫师来表演的。

巫师在羌族社会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他、他的法事、法器和诸神被人们认为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因而他可以表演对人们有利的奇迹。

此外，还有一些禁忌，因为如果这种神奇力量被错误的利用会很危险的。

羌族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民族。

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中，人们找寻食物、祈雨、求好收成、长生、求子孙繁衍、家畜兴旺、保平安、社会地位与荣誉，以及盼望过富足的生活。

这些表明了许多人相信经书是活的生命，相信作法的猴头帽可以看见听见，人们甚至也相信树和石头都有神灵，而去崇拜它们。

要尽量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个民族，就要像学生一样，尽可能地学习汉族、藏族和其他中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同时还应具有原始宗教和原始人群方面的知识。

他还要学习其他人写的有关羌族方面的文章，并能深入而直接地调查，掌握到羌族的知识。

还没有证据说明羌族是希伯来人的子孙后代。

相反，他们的语言、习俗和体质特征表明他们属于黄种人的藏缅支系。

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他们在若干世纪以前来自中国的东北部，被汉族赶到了西部。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到了甘肃及更远的西部，其他的人向南到了四川。

过去，他们从松潘往北扩展到了甘肃，南至雅州、越嶲附近。

但是现在他们只聚集在北至叠溪，南至索桥，汶川、威州、茂州以东几英里，西至理番杂谷脑河(沱河)约10公里的叫蒲溪沟的寨子这些地方。

至于川西羌族的未来，我们只有推测。

他们会被汉族完全融合吗?或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固守着他们自己古老的习俗、传统和宗教?只有时间能告诉一切。

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博士的《安阳发掘简报》第一部分，其中三足陶器确有同样的饰纹，他认为是仿丝带或绳带纹。

李济博士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在殷墟和广汉文化中发现同样的纹饰，这确令人惊异。

殷墟文化的年代判断为从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122年，即殷商时期的文化。

安特生(J. G. A1lder)博士曾说过：广汉和河南仰韶的出土物极相似。

大大小小的石斧、石凿、石刀、石杵或斧、石璧、三足陶器、绳纹、小颈、尖底、砖红色圆形陶容器，陶纺轮，以及带有绳纹与刻纹的陶碗与陶缸等。

在两个遗址里，没有发现金属器物或符号文字。

其重要的区别在于仰韶遗址中出土有彩陶，而广汉遗址则未发现。

安特生鉴定奉天沙锅屯文物与广汉文物均属新石器时代，它们有令人相似之处，自然制作上也有明显区别。

两者都有石斧和石凿，绳纹与刻纹，大小石珠，它们的形状和制作大致相似，沙锅屯的收藏品的器口稍圆。

两者均有扁平的石璧，绳纹和刻纹陶以及黑色和单色陶等。

殷墟出土文物和广汉文物有明显区别，自然也有大致相同之处，如石斧、石刀和石凿以及陶器的刻纹和印纹等。

不同之处就颇弓人注意了。

殷墟出土文物有大量的青铜器、甲骨文、骨器、彩陶等，但广汉附近遗址就未发现丝毫这类遗存。

这次广汉收藏品中有两个较突出的特点：在玉刀、玉剑和玉凿上发现有金属线锯刻划的痕迹，它们与周代使用的方玉、玉璧、玉剑和玉凿的纹饰极相似。

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较重要的差别，周代玉器常刻有生动的禽鸟和动物形象，这次广汉收集的标本中就没有发现这类饰纹。

按上述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给它定为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译者按：原文aeneolithie时期，其意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意译为铜石并用时期)。

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在四川采集的器物标本从汉代早期至满清时期的陶器。

但就这次采集的陶器而论；是与汉代陶器有区别的，另一方面，似乎后者是从几个世纪以来发展成的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出现这些相异的陶器也是必然现象。

此外，广汉文化与华北和中原地区已知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传播很清楚地看到证据。广汉的非汉族人民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早期文化影响颇深，或者是四川的汉人或汉文化比前人所定的时期还要早些。

据目前的这些资料，结论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

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

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译者按：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意译为铜石并用时期)。

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均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温故而知新 ——20世纪早期华西边疆研究的历史价值(代序)

霍 巍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西部边疆战略地位的日益显著,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西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集中了一批海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师和学术精英,在大西南开展了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调查与研究,撰写出版了一大批代表着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论著,为西南地区的传统文化研究开创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在国际学术界获得了崇高声誉。

重温20世纪早期华西边疆研究的历史,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学术重镇——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西大学)博物馆和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所起到的开创性作用。

华西大学博物馆是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前身,从其创建至今,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1914年,华西大学理学院教授戴谦和(Prof. Daniel Sheets Dye)开始收集有学术价值的文物与标本,并获得当时热心人士之捐赠,形成一定规模,是为华西大学博物馆初创之始,但因经费有限,一直进展缓慢。

其后,又蒙陶然士(Mr. Thomas Torrance)、叶长青(Mr. J. Huston Edjar)两氏之合作,加之四川省社会各界若干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慷慨捐献,至1931年,已收集到文物和标本约六千余件,陈列于华西大学赫裴院内。

对于推进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和学术研究直到过重要作用的,必须提到两位先后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著名学者。

1932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开始重视华西大学的博物馆建设,遂派遣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博士来成都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

葛氏才学兼长,在他任职的十多年当中,一方面继续以各种途径广泛收集文物标本,丰富馆藏,另一方面,他亲自主持了四川及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多项田野工作,使华西大学博物馆所获资料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更为科学、系统。

由于葛氏之努力拓展,华西大学博物馆时已成为当时中国西南最为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葛维汉在任期间,组织了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使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引起当时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经过其后历次考古调查与发掘,三星堆遗址及巴蜀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今天西南考古的核心内容之一。

葛氏的开拓之功当载入史册。

紧接葛维汉之后,接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郑德坤先生。

与葛氏不同之处在于,郑德坤先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前来接替葛氏馆长一职的(其任职期间为1941—1946年)。

当时的成都已成为敌机轰炸之目标,华西大学的许多标本都已疏散,校舍也多挪作它用;加之社会动荡、法币贬值,如何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是对郑先生的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

郑先生在他接任之初,首先便着力制定了华大博物馆“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按期推进工作。

在规划中郑先生明确提出:“该计划目的在整理标本,作系统之陈列,且与文学院课程配合,以作实物教学之提倡,务达利用乡土教材,以促进吾国教育之本位化。”

按照这一规划,郑先生积极推进对作为当时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各类考古、民族学资料的整理与收集工作。

在五年当中先后组织了四次考古发掘,包括汉墓、唐墓、王建永陵、文庙旧址等,同时还组织进行了数次田野调查,采集到大批新标本。

作为博物馆的基本建设规划,在当时极为艰难的客观条件下,郑先生积极推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工作。

据他自述:“因受空间及不良环境之限制,陈列工作甚慢,五年来移动安排,无日不在进行中。”

前后设计布置,不下四十次,每一更动,则使陈列室陷入混乱状态者数日以至数月。

经过郑先生和当时与他共事的林名均、梁利滔、苏立文、宋蜀青、宋蜀华等先生的共同努力,使当时的华西大学博物馆形成为包括中国石器与雕刻、中国金属器、四川陶瓷器、西藏文物、西南文物等七个部分组成的常设陈列展出,具有独特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初步奠定了后来四川大学博物馆陈列的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基本风格。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吸引参观者，在郑先生的主持之下，华西大学博物馆还先后举办了古玉展、馆藏书画展、藏传绘画展、佛教雕刻展、陶瓷展、英国刻画、图书展、美国建筑展等多种特别展，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以至当时援华助战美军士兵等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华西大学博物馆也因之名声大盛，被誉为成都当时的“重要名胜地之一”。

.....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编辑推荐

本书是美国学者葛维汉关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论著的选集。收录了"羌族的习俗与宗教"、"四川苗族的宗教与习俗"、"四川苗族的故事与歌谣"、"华西协合大学古博物馆的石器"、"四川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等文章。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